

淺談近代西歐的

藝術與社會變遷

劉過



約西元1150-1200年 象牙西洋棋（主教） 高8.8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本次「世界文明瑰寶——大英博物館二百五十年收藏展」，其中「中世紀、文藝復興及以後的歐洲」的文物，年代跨越了幾個大時代，時間超過六百年。從十三世紀至十九世紀，六百年間，西歐社會經歷了「中世紀晚期」、「文藝復興」、「啟蒙時期」、「美國與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帝國主義興起」等重要歷史時段。與此同時，中國則經歷了宋元明清四朝；四朝之間容或有政治統治的鬆弛緊張的差異，或有經濟總產量與人口總數的起降，統治版圖也因朝代國祚與強弱之不同而有所變異，甚至還經歷兩次北方游牧族的統治，但是大體上此四朝的社會結構、政體、思想、藝術、宗教、科技等等文化表現都在同一個大傳統內緩

緩前進，許多歷史學家甚至稱此段中國歷史為中國之「近世」，有別於唐代之前以及鴉片戰爭之後的歷史發展。「近世」之說，表示此六十多年的歷史有其政經社會結構的可比較性。相對之下，西歐在這六百年所經歷的轉變，不啻鉅變一辭所能形容。本文既無法深論這六百年歐洲政治與社會的轉變，亦無法勾勒此時期的藝術流變。本文只能以鳥瞰的觀點，略述藝術風格與潮流的轉變與政治、社會型態的轉變之間的呼應關係。

政教分離的中世紀

西元五世紀之後，日耳曼人、盎格魯薩克森人、東西哥德人等等，在西羅馬帝國的土地上建立以封建制度為政治、經濟生產依據的生活模式。封建社會裡，最大的政治經濟單位為「國」。國王之下轄有公爵、伯爵、子爵等依序而降的世襲貴族。國王與各貴族均有封地；封地內有佃戶。封地外則有不受封建法所約制的自由

城市，城市內有工匠等平民。雖然羅馬帝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在蠻族所新建的封建社會裡多數被夷毀了，不過，宗教制度卻保存了下來。以羅馬教廷為首的天主教系統，成為漫長中世紀信仰的中心與知識領航者。簡單說，中世紀是政教分離的世界，這情況要到一五一七年宗教改革之後才逐漸改變。教皇與國王成為宗教與世俗兩個世界的領袖，這時期流行的「雙劍論」，承認兩個權力不相統屬；天主教本身也是個階層分明的體制，教會系統中的教士有如王國中的貴族。因此，國王與貴族、教士、平民就成為中世紀政治與經濟關係中的三個重要階級。今日被視為藝術作品的中世紀文物，大多屬於高階貴族與主教的儀式文物，例如權杖、基督造型雕刻等。

從十三世紀起，由於受到東方蒙古與回教勢力的圈圍，西歐王國聯盟的勢力侷限於歐亞大陸最西邊的邊緣上。至少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也就

是法、德、西、葡、英等國在五大洲建立龐大的殖民帝國之前，西歐各國大抵仍以中世紀的封建王國為基礎，版圖上的改變不大。

西歐的崛起原因極為複雜，簡言之，從十三世紀中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的六百年間，歐洲政治制度、思想、藝術、科技、經濟等等生活價值，均經歷了全面性的改變。在這六百年間，西歐從中古轉變到近現代；其生活型態從地方性、傳統主義的封建社會，逐漸轉變為強調進步與未來的現代社會。當然，社會型態的轉變是極其漫長的過程，而且許多被稱為現代式的生活或生產方式，也可在中古時期找到類似的事徵。

城市的興起與文藝復興

城市的興起是歐洲漫長而鉅大轉變的濫觴；歐洲中古城市的興起，其原因並不單純，但是十字軍東征顯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保衛基督教以及經濟誘惑的因素下，十三世紀的

西歐發起幾次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十字軍東征。這個軍事運動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基督徒自回教徒手中取回地中海的航行權，地中海重新成為可供商業運輸的海域；於是，沿地中海地區的城市之間，發展出區域與區域之間的貿易網絡。威尼斯早在十字軍之前，就一直做著自東方輸入工業品與奢侈品的買賣；但是「威尼斯的商人」的影響力，是在十五、六

世紀的「地中海時代」才登上巔峰。莎士比亞以「威尼斯的商人」作為他雋永文學的標題，其實是標示了一段重要的歷史發展。

伴隨著緩慢而持續的貿易復甦，城市的興起養活了更多不依賴土地過活的人。根據封建法，一個逃離封建主人農地的佃農，在城市住滿三百六十五天，就自動成為「自由人」，所以中世紀俗諺

有云：「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這些自由人初以工匠營生，當經濟越來越發達，分工越來越細之後，使用腦力的人也開始出現，例如律師、教師、以及與印刷業相關的各種人士。在政治上，這些人都是平民階級；換言之，城市的興起造成平民階級在質與量的成長，經六百餘年的歲月，終於在十九世紀成為歐洲政治與社會的主導者，也意謂著使用流



約西元1504年 義大利 聖女圖 高41.1公分 寬26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西元十六世紀末期 希臘 沉睡聖母及聖徒像 高17公分 寬26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動金錢的富裕平民階級，取代了土地貴族階級。

當然，這個轉變的過程極為緩慢，而且不管如何，貴族與教士依然是歐洲經濟復甦的第一波受益者。雖然希臘與羅馬帝國的書寫文明、表現文化，在中世紀時期沉寂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其精神仍以書本文獻與斷垣殘骸的形式被保存了下來。十二世紀時，東羅馬帝國遭遇新興的土耳其人攻擊，許多東方的學者倉皇西遷，帶來一波古典學知識；而十字軍的東征，又讓西歐得以更廣泛接觸到古羅馬帝國時期藏於君士坦丁堡（後為土耳其帝國所轄）以及西班牙南部地區的希臘與古拉丁語圖書文物。

經濟發達以及古希臘、羅馬文物的逐漸流傳、譯介，自十四世紀開始，環地中海地區的文藝思想開始活潑起來，以致產生後代史家筆下所描述的「文藝復興」運動。大抵說來，文人熱中於鑽研古希臘與古拉丁文的文本、書寫與思

想；而社會菁英，如教皇及主教們、政治家與貴族，則開始學習藉由視覺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築等，來彰顯他們的權力。「文藝復興」雖然是一種世俗化的運動——例如有些聞人開始撰文反對修道院生活、象徵出世或宗教精神的哥德式尖塔建築也開始受到拱頂建築或其他象徵人文主義精神的建築的挑戰——可是，宗教題材依然是十五至十六世紀這兩百年歐洲繪畫的主流（佔約百分之八十），例如以聖母與聖嬰為題的作品，其數量之多已難以估算。而金匠藝術、貨幣、徽章等與視覺藝術相關的工藝也越來越精美，成為貴族家中向親友炫耀的收藏。當然，少數新興商人階級也出現在贊助藝術的行列之中，所以我們也會看到當時有一些題為「青年商人」的畫像。

既然這些社會菁英開始喜歡並利用藝術，藝術工作者就逐漸有了自我鞭策與追求精進的動力。他們配合科學知識，例如解剖、數學、光學等



西元1466年 義大利 卡拉卡拉紀念章（正、反面） 直徑9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等，來掌握視覺藝術的表現力道。於是空間感、光影、黃金比例、圓拱屋頂建築等新的藝術形式都在此時陸續開發、完美化；和科學革命一樣，這時候的藝術家都相信他們可以表現出世界的實體，而繪畫史上的文藝復興風格與風格主義（Mannerism）就表現了這種新時代的企圖。

貴族的沒落與宗教革命

商業的發展固然使得出版、藝術創作更加蓬勃，卻也讓原本守住土地的貴族開始受

到流動金錢的誘惑與衝擊。西歐的商業透過萊茵河等重要水路，將發軔於地中海的商業網絡擴及於北方諸國，漢堡、布萊梅、魯北克、阿姆斯特丹、里昂等城市連結成歐洲的商業地圖；和藝術的完美化過程相類似，各類商品如紡織、顏料等，也在市場的擴展與競爭下逐漸精緻化。

十五世紀以後，西班牙在中南美洲建立了龐大的帝國，他們從祕魯等地傳輸大量白銀進入歐洲，使得這部新的歐洲貿易機器得到足夠的潤滑油；

意謂貴族們越來越容易取得奢侈品以及雇用工匠來興建豪宅。長時間下來，許多貴族因為追求新式生活而超支破產，他們開始出售土地，也漸漸失去貴族的實質影響力。

一五一七年，日耳曼地區的神學家馬丁路德，於韋騰堡（Wittenberg）大學門口張貼「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替爾後蔚為狂潮的歐洲宗教改革揭開序幕，而實際上，宗教改革影響層面之廣與深，絕非三言兩語可以盡述，其中，它直接造成

教皇勢力的衰退，間接促成各民族國家的發揚。從一五二〇年代起，歐洲開始經歷一連串的内亂與國際宗教戰爭，最終，除愛爾蘭等少數例外，歐洲大抵上分割成南歐的天主教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日爾曼南部巴伐利亞邦）與北歐的新教國家（荷蘭、英格蘭、蘇格蘭、日爾曼北部如普魯士邦）。戰爭使得國王更便於統籌資源，其權力也因此得以擴張。於是，原本就受到金錢經濟衝擊的封建制度及其貴族階級，在面對國王權力時就更加羸弱。而以君主主權為綱，以民族國家為目的之新政治結構從十六世紀開始迅速成形；到了十七世紀中葉，這個新政治結構成為西歐的政治文

化骨幹，其強調對等，強調外交與軍事平衡，成為國際政治的主流。

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國家在政治文化上頗有差異，粗略言之，新教國家承襲路德與卡爾文教派的神學教條，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教士，比較強調個人主義與平權觀念，所以地方權力比較強；天主教強調順從，所以中央集權或「開明專制」的色彩較濃。另一方面，基督新教比較注重文字而排斥視覺藝術，所以普遍上，新教國家的識字率比天主教國家為高；可是天主教國家的藝術成就遠比新教國家為高。因為中央集權或「開明專制」的宮廷與教廷是精緻藝術的最大贊助者，故巴洛克繁複的風格成為

展現世俗宮廷與羅馬教廷的最佳語言，如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是當時藝術與權力相互輝映的登峰造極之作；而借助藝術家如貝里尼（Gian Bernini, 1598-1680）雕刻金碧輝煌的神壇，則為了彰顯天主教的威嚴。在音樂上，從十七世紀開始，羅馬天主教鼓勵使用對位法製造合聲效果，也是用來呈顯宗教的莊嚴與隆重。總之，新教利用文字語言來傳教（福音），天主教利用藝術來說服人們改宗。

雖然新教國家內的藝術相對地缺少了中央集權的王室與教會的支持；但它反而因此更貼近庶民生活，這可從十七世紀荷蘭畫家林布蘭特（Rembrandt H. van Rijn,



約西元1100年 法國 基督受難像
高27.2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約西元1650年代 荷蘭 阿德里安范德費爾德 (Adria van de Velde)
馬背上的騎士 高28.8公分 寬19.5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1606-69) 的作品窺出端倪；林布蘭特的畫作常以庶民、城市公民、動物、風景、自畫像為題材。事實上以日常生活景物為題材，一直是荷蘭畫家的重要傳統之一，也難怪會有歷史學家宣稱，十七、十八世紀荷蘭的繪畫可以直接當作社會史的史料來使用。

帝國主義與現代世界的產生

區域經濟的興起或商業社會的出現、文藝復興、民族國

家的興起、宗教改革、科學革命等等歷史運動，聯手摧毀了行諸千年的封建制度，今天歐洲社會的基石與文化底蘊莫不從上述大變革而生。但是今日吾人所感受到的現代世界，其淵源其實與工業革命、美國革命及法國大革命更息息相關。這三波發生於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革命，深刻改變了歐洲人乃至於現代世界人的思維與價值。十八世紀的西歐，尤其是西北歐，是個「富而好禮」的社會，這裡的禮，可以

解釋為秩序。

由於大航海時代（一般從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抵達美洲起算）的長期影響，航海技術更進步了，市場與原物料的取得越形方便與擴大，造成農業技術與工業逐步發展。大航海時代及其後發展幫助藝術家尤其是畫家題材的多樣化。例如荷蘭畫家常以熱帶水果作為靜物素描的題材；這與荷屬東印度公司在熱帶亞洲的殖民歷史有關。所以荷蘭十七世紀歷史上的政治黃金歲月、殖民、藝術成就等等現象其實是合在一起的。從整體歐洲歷史的發展來看，大航海時代對藝術事業的影響層面是讓藝術專業成為可能。金錢經濟的確立與活絡讓勞心者有了立足之地，富裕也使得社會結構朝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一方面，因為財富增加，家族與社群原本所擔負的互助功能減弱了，小家庭成為社會結構的核心，也強化了從早期現代以來所發展的個人主義傾向。另一方面，也因為富裕，使得公共的建制越來

越普遍，中產階級與士紳逐漸將注意力從家族的延續轉移到社會的進步之上。十八世紀比起之前任何時代，出現了更多的公共圖書館、博物館。這裡的公共與我國普遍將公共視為「國立」或「公立」不同。西歐的公共機構常常是私人捐助，只是在法規上，接受公共的監督，所以這些機構所代表的是相對富裕的城市階級的品味，而非官員的品味或控制。透過這些公共的機構與展示，藝術的經典化過程越來越普遍。

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只是歐洲十九世紀一連串政治與社會革命的序曲，但這些變革累積了一定的社會動能，從某個意義上說，歐洲從十九世紀初開始以更積極地佔領、壟斷其他世界，多少是為了舒緩歐洲內部因各種社會動能相互激盪而可能產生的騷亂與失序。英國在十九世紀初就佔領了大半的印度半島，並在十九世紀伊始，便積極投入非洲的壟斷活動；一八三〇年代，對

中國的「封閉」貿易政策也不耐到臨界點了；法國從十八世紀中期開始便急起直追，尤其在拿破崙執政後，更是積極推行海外帝國政策。拿破崙垮台之後，法國政府基本上沒有放棄這樣的政策，仍與英國爭奪國際勢力。於是，東方人所熟悉的帝國主義勢力，逐漸從西歐雲捲而來，籠罩整個東方。

現代思維下的藝術王國

六百年來，歐洲人從土地與家族中解放出來，組構了一個名之為社會的公共生活內容；同樣的，藝術創作也從早期對貴族與宗教的依賴關係裡解放了出來，並逐步形成自主而獨立的族群，藝術有了自己的工業、網絡、市場，並養活了一群評論家，藝術家的獨立性則讓他們獲得更大的自由以求自我呈現。

大概從十九世紀初以後，藝術家多少帶有社會批判或知識份子性格，正如同他們的藝術創作越來越強調個人的靈感、個性、精神、創造力，這

是十八世紀以前的藝術家所夢想不到的情況。這當然不是說，米開朗基羅或達文西從事創作的時候，得完全依照贊助者的意見；這也不是說，十九世紀以後的藝術家完全不受外界的控制或限制；這只是說，現代藝術家更有自主意識地與他的社會或文化環境互動。

十八世紀晚期以來，歐洲政治與社會革命，使得意識形態的出現、傳布、消長像潮汐一般往返。藝術表現除了成為中產階級家庭收藏與欣賞的物件外，它同時更密切地涉入與國家、政治、革命、生活價值等等爭議的傳播之中。藝術家本身成為了制度，而且是具有社會意義的個體生命。除了隱形的市場，他們好像不再依附於任何權勢，於是盡情嘗試各種媒材，實驗各種佈局、光影、色彩、造型……好像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座藝術王國，而他們自己就是國王，這對一名十四世紀替巴黎某聖母院雕刻耶穌受難像的老工匠而言，這樣的王國實在無法想像。